

抗战时期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迁昆明办学回眸

王天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大量工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纷纷西迁至云南昆明及其周边地区。西迁高校中,除了广为人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外,国立中山大学、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等一批学校同样在祖国的西南边疆筚路蓝缕,共同书写了一段教育史上的传奇。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国立艺专”),其前身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是20世纪初民族救亡图存背景下先后成立的两所美术教育学府。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平艺专南迁,到达湖南沅陵后,于1938年奉令与西迁的杭州艺专合并成立国立艺专。面对抗战形势的急转直下,国立艺专被迫再西迁至云南昆明。本文从档案视角,回顾国立艺专西迁昆明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及办学历史片段。

安江村的“安定时光”

1939年12月,国立艺专迁至云南昆明呈贡县江湾乡安江村(现属昆明市晋宁区),在此之前,1939年1月至12月间,国立艺专师生曾租借在昆明市区的东寺街、文林街等地,但随着日军空袭加剧,国立艺专又迁往昆明郊区——滇池边的安江村,在这个条件艰苦但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乡村继续办学,在这里,国立艺专的教学活动得到恢复,公共课、专业课相继开设,其中的一份档案这样记录道:“择定江湾乡安江村为校址,并经商得当地土绅同意,借定该村关圣宫、观音寺……龙王庙、

地藏寺等六所全部房屋为校舍,已由该校从事修葺……”(1939年11月23日云南省政府发出《关于协助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租借房舍由的训令》),国立艺专得以在安江村坚持艺术教学、培育艺术新人、保存艺术文脉。

直接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40年初,刚从昆明市迁至安江村后不久,面对时局变化,国立艺专师生在校长滕固的带领下发出通电,直接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积极参与、宣传全民族抗战,展现民族大义。

在1940年3月23日国立艺专发布的通电中,学校全体师生表达了拥护抗战国策的坚定态度,并一致声讨当时与日方签订密约的叛国行为,展现出誓与国家共存亡的决心,这一行动充分体现了师生们高度的责任感和深沉的民族大义。

用手中国画积极宣传抗战

国立艺专被称为“艺术界的西南联大”。这所抗战中“漂泊的艺术殿堂”在云南昆明期间汇集了众多当时的艺术大师,并培养了诸如吴冠中、董希文、李可染、朱德群、赵无极等一批现当代艺术大师。受到艺术启蒙的学生,在面对民族危亡的关头,自觉自醒,纷纷拿起手中的画笔,以笔为武器,举办抗战画展,参观者络绎不绝,在当时的昆高校中产生了巨大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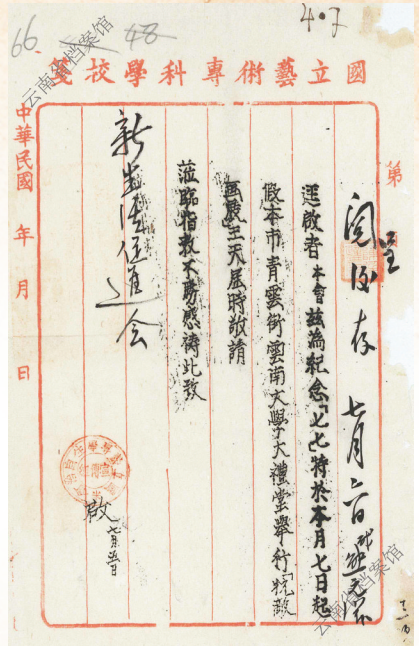
“本会兹为纪念‘七七’,特于本月七日起,假本市青云街云南大学大礼堂举行‘抗战画展’三天,届时敬请,莅临指

教,不胜感祷,此致”。这是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的一份1939年7月5日的档案,从这份档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抗战画展”的主办方是国立艺专的学生自治会宣传组。相关资料显示,国立艺专在昆明期间多次举办这类画展,受到艺术启蒙和民族精神唤醒共同启迪之下的学生们创作出了大量以抗战为主题的现实主义作品,使抗战艺术更加绚丽多彩。

抗战时期艺术家的成长

抗战时期,国立艺专大师云集,积累了十分雄厚的艺术师资,如林风眠、滕固、吕凤子、潘天寿等先后在该校任职教学。其中,吕凤子、陈之佛、潘天寿因卓越的艺术建树和教育水准被人们尊称为“艺专三杰”,成为抗战时期艺术教育的模范。国立艺专以特有的艺术教育优势、艺术创作优势,推动了抗战时期我国艺术事业的迅速发展。其培养的学生,如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人先后赴欧洲留学,最终均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代艺术大师。更为可贵的是,在家国危亡之际,一些学生选择了追求革命的道路,他们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成为后来新中国艺术的栋梁。……正因为这些优秀艺术群体的出现,使国立艺专成为抗战时期在大后方抗战艺术教育、积极服务抗战的一股重要力量。

1940年8月6日,日军攻占越南海防,一时云南防务告急,国立艺专接到再做迁校准备之命令,于是,该校随即迁往四川璧山县,1941年再次迁至重庆沙坪坝,至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终得以



此份档案为:1939年,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邀请云南省新生活促进会参观抗战画展的函。 云南省档案馆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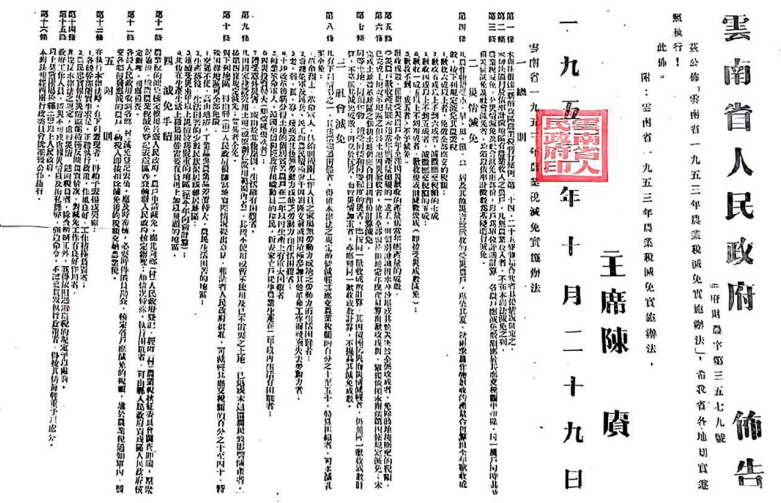
迁回杭州。

从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有关国立艺专档案史料中可以看出,虽然在昆明的办学时间不长,但国立艺专积极宣传全民族抗战,积极开展艺术教学活动,在当地普及先进科学文化和艺术教育,泽被地方文化和艺术教育的发展。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馆)

边疆治理的早期实践：回望1952年的云南农业税减免

李有文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的发布,再次释放出强农惠农富农的强烈信号,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回顾新中国初期,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推动边疆建设、巩固民族统一的历史背景下,云南省政府发布《云南省1952年农业税减免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其中立足边疆实际、兼顾民生与稳定的税收调节思路,与当前“三农”工作中“保民生、促公平、强边疆”的核心目标深度契合,以史为鉴,可为今天边疆地区乡村振兴与民族共同发展提供历史镜鉴。

《办法》出台的历史背景

1952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省刚历经战乱,全省农业基础设施遭遇严重的破坏,作为边疆省份,经济基础薄弱,亟待政策扶持以激发生产活力。同时,20世纪50年代初完成的土地改革虽使数百万农民分到土地,但却揭示出像生产资料短缺等新的矛盾。又因旱涝灾害频繁降临,农民收入有着剧烈的上下波动,如何巩固土地改革成果、杜绝因税负过重造成返贫成为紧迫课题,这一困境在边疆治理特殊语境下愈发错综复杂。云南的土地上聚居着多个民族,各种矛盾交织,亟须采用税收优惠政策大各个民族的向心力。1952年春夏期间连旱引发的严峻灾害,导致全省多地陷入饥荒、粮食减产超三成,灾情与传统田赋制度的叠加形成“税灾共损”效应,最终倒逼政府把农业税减免作为破解经济困局、促进边疆社会稳定的关键政策工具。

《办法》的主要内容

《办法》采用五章的划分,整个文本有16条。总则部分表示《办法》以中央政务院农业税政策为依据,结合云南的实际情况而制定,以实现农业税减免工作规范为目标,其适用范围囊括云南省从事农业生产且拥有农业收入的全部农户。然而,对于无故抗拒纳税的农户,则不在减免之列。农业税减免分为灾情减免与社会减免两大类,均以户为单位进行评定和计算,农户之减免税额将在其应交税额中予以扣除。若同一农户同时满足两类减免条件,则将执行其中较高的减免标准,以确保政策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就灾情减免情况而言,《办法》按照农作物受灾欠收的严重程度,按照科学合理的方式划分出4个减免档次,若欠收程度超过50%且不足60%者,采取减免税额70%的措施;若欠收程度达到40%以上却不足50%者,实行税额50%的减免;若存在欠收比例在30%以上不到40%的情形,采取减免30%税额的做法;若遇到欠收比例未达30%的状况,不进行税额减免。针对受灾农户计税土地,因灾情形成完全失收的情形,《办法》表明可对该地块全年税额进行免除,以此展示对受灾农户的切实关怀,从已展露土地改革的地区这个角度,将以农户全部土地应缴的税额为参照核算减免成数,其中那些未完成土改的地点,会按照同等土地受灾情形开展评定,以此保障政策的连续性与统一性,若同等地里的同类作物遭遇同程度灾害时,《办法》规定需采用同一标准计算欠收成数,其中“成数”一词明确指向受灾农户本年实收产量占常年应产量的比值,用以精确反映灾情对农户收成产生的后果。其中不

管农户对于抗灾是积极付诸行动还是消极搁置不理,皆按此既定标准核算减免比例,以此维护《办法》所涉政策的公正权威。

《办法》也将特殊群体的农业税减免问题纳入关注范围,其中供给制工作人员家属、烈属、军属中缺乏劳动力的群体;安家开展生产活动未满2年的转业军人;年老体弱、孤寡残疾且缺乏劳动力的特殊困难群体;新得到土地2年内生产出现重大困难的对象;由政府组织进行移民后新立户、2年内出现生活困难的人员;意外灾害造成生活陷入困境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减免”对象里有经县以上政府认定需照顾的其他主体,减免幅度依照农户实际情况确定,减免幅度以应缴税额的10%至50%设定上限和下限。就特困户这一群体而言,经专署审核批准后可把农业税全额豁免,进而体现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呵护与援助。

为提高政策权威性 & 规范性,《办法》额外规定了相配套的执行程序及奖惩机制。就执行程序方面而言,《办法》规定农户得如实填报《农业税减免申报表》,完成村评议、区审核工作后报县市人民政府核定,收到申报表之后各级政府需实地检查农户实际情况,把减免税额核定清楚后书面通知纳税人,纳税人需按照经核定减免后的税额,按时缴纳农业税,为保证税收按时入库及政策有效开展。同时《办法》对秉持实事求是是执行政策的干部和如实申报、积极协助税收工作的群众进行表彰奖励,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农业税减免工作

《办法》的历史意义

减轻农民负担,激发生产活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农民税负压力沉重。《办法》通过减免农业税直接降低农民负担,使其能够留存更多粮食用于生活改善和生产投入。政策实施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推动了土地改革成果的巩固,加速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同时税收减免与政府推广良种、兴修水利等扶持措施相结合,为云南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和粮食增产奠定了基础,为国家工业化战略提供了稳定的农产品支持。

促进社会公平,强化基层治理。《办法》通过调整累进税率和免征额度,体现了“多收入多负担、少收入少负担”的公平原则,纠正了旧社会赋税不均的弊端。尤其是对贫困山区和受灾地区的定向减免,彰显了新政权政策的温度。在基层执行层面,《办法》要求严格核算土地产量、规范征管流程,既遏制了地方摊派和贪污的现象,也推动基层干部深入农村了解实情,强化了政权组织与农民的联系。这一过程有效提升了新政权的治理效能,为云南农村社会秩序重构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缩小民族差距,维护边疆稳定。云南作为边疆多民族省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办法》特别规定对少数民族聚居区、边境沿线及高寒山区实施更大力度的税收减免,通过经济扶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这一举措不仅缓解了民族地区的生存压力,更以实际行动增进了少数民族群众对新生人民政权的认同。

【作者单位: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党史党建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朱德林业建设思想研究”(课题编号: DSDJ25—11)的阶段性成果]

公谊救护队的滇西抗战医疗史

唐绍齐

公谊救护队(The Friends Ambulance Unit, FAU)成立于1914年,是致力于人道主义救援的国际宗教慈善组织。其中国救援队于1941年成立,罗光普担任负责人,当时他率领首批46名队员来华。队员需接受急救、汽车维修等多项医疗专业培训。二战期间,共有300多名来自多国的队员在华参与救援。

公谊救护队抵华后,主要承担物资运输与医疗救援两项任务。该队负责将抵达仰光的国际援助物资经此干线运至昆明,再转运至西南后方及前线。1942年缅北沦陷、滇缅公路中断后,队伍随即将指挥中心设于云南曲靖,构建新的陆路运输体系,将经“驼峰航线”空运至昆明的物资,经由黔滇公路险段晴隆二十四道弯等地转运至贵阳、泸州等枢纽,进而分送广西、陕西、四川等地。资料显示,1942年7月至1945年12月,公谊救护队运输量大幅增长,所运物资以医疗药品与救济品为主。在抗战最艰难阶段,全国约90%的平民医疗用药依赖其运输保障。

公谊救护队在抗战时期对云南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们组建了多支由医生、护士和护理人员等六七人构成的流动医疗队,分赴云南抗战前线,为军民提供医疗救护。全国抗战期间,公谊救护队共派出12支流动医疗队,其中7支为战地医疗队。1942年,第一流动医疗队抵达保山,与驻扎该地的第71军及

中国红十字会合作救治伤员。同年4月底,日军攻占腊戍,滇缅公路被切断,中英军队被迫向印度和中国境内撤退。该医疗队为史迪威所率114人提供了紧急医疗支援,以担架运送伤员跋涉140英里,安全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此后,队伍又转赴印度雷多,为集结于此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提供救护,直至同年9月返回昆明。

1942年5月初,日军对云南保山实施多日轰炸,导致城区严重被毁、数万平民伤亡。轰炸后当地爆发大规模霍乱,因医疗设施损毁及尸体堆积,疫情迅速恶化。5月下旬,日军进犯滇西,中国远征军炸毁惠通桥,沿怒江东岸布防,形成对峙。其间,公谊救护队第二流动医疗队与红十字会等组织协作,在保山建立临时医院救治伤员。由于当地地理气候适宜蚊虫滋生,加之人员流动密集,军队中暴发恶性疟疾。公谊救护队随即组建巡回医疗队,在10日内诊疗401人,验血95次,并分发奎宁3万片,有效控制了疫情蔓延。(贵阳市档案馆:《战地红十字——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实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1943年6月,公谊救护队第三流动医疗队赴云南下关第11集团军驻地开展灭虱、疫苗接种及战地医疗服务。该队于工作,并于1944年8月作为首批医疗队进入收复后的腾冲。1943年10月,随着中

国驻印军向缅北日军发起进攻,中国远征军同时进攻腾冲。公谊救护队受中国红十字会领导,承担滇缅战线救护任务,其第四流动医疗队在云南砚山协助野战医院手术,并向官兵与居民提供医疗救治及卫生培训。据《中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记载,队伍常跋涉于交通艰险的山区,夜宿敌军弃置工事,环境极为艰苦。公谊救护队始终活跃在抗战前沿,为战地医疗救护作出重要贡献。

公谊救护队在开展战地救护的同时,也为云南的公共卫生防疫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9月腾冲收复后,公谊救护队随即进入该地,并发现当地正流行鼠疫。医疗队队伍迅速前往疫情严重的南甸地区,经诊断确认后,立即使用磺胺药物和抗毒血清对患者进行救治,有效控制了当地疫情。同年年底,公谊救护队代表参加了由中央防疫处组织的腾冲防疫会议,会后积极为民众接种疫苗,开展防治工作。至1945年1月,腾冲鼠疫已基本被扑灭。其间,救护队队长罗伯特·麦克卢尔亲赴疫区视察,为掌握疫情实况和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4年10月,公谊救护队第八流动医疗队在腾冲联合多方成立医疗防疫委员会,并创办科室齐全、设备先进的腾冲医院,为军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该院于1946年更名为中美和平纪念医院,后发展为今腾冲市人民医院。同期,第十一流

以校史文化锻造强大思政引领力

——《西南林业大学扎根系列丛书·教育家精神》评介

本报记者 沈艳

在云南这片生态资源富集的红土地上,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与祖国边疆的建设同频共振。近日,西南林业大学推出《西南林业大学扎根系列丛书·教育家精神》(以下简称《扎根系列丛书》),以三卷本、近60万字的规模,系统梳理并记录了张海秋、徐永椿、曹诚一、薛纪如四位林业教育先贤的生平事迹与学术精神,该丛书的出版,不仅是对学校办学历史的深度梳理,更是对“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理念的生动诠释。

“扎根”之名的深意,“扎根”既是林业事业的自然隐喻,也是教育事业的精魂内核。从丛书的编纂,是西南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魏宏教授在丛书首发式上谈道:“树木成才,必须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树人成才,亦需厚植根基,坚定理想。”这一命名,既呼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殷切期望,也凝练了西林人薪火相传的价值追求。正如该校校歌中所唱:“我们是青松,我们是白杨,理想的根须扎在祖国的土地上。”翻开丛书,中国现代林业教育先驱张海秋先生的身影徐徐走来,这位云南林业高等教育与中国森林经理学学科的创始人,用40余年

教育生涯践行“科学救国”的初心;徐永椿、曹诚一夫妇并肩深耕植物分类与昆虫研究,在边疆林学领域写下协同攻关的佳话;被称作“云南竹子第一人”的薛纪如先生,唤醒沉睡的竹类资源、开发“绿色的金矿”,创建的竹类标本室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们从五湖四海汇聚西南边疆,将论文写在云岭群山之间,把育人使命融入三尺讲台,共同勾勒出西林人“爱国奉献、艰苦创业、扎根边疆、创新求实”的历史传统,成为“树木树人、至真至善”校训的生动注脚。

五年磨一剑,以敬畏之心书写校史文化。从丛书的编纂,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从2021年启动到2025年正式出版,编委会历时五年,走访数十位老教授与先贤家属,查阅上万页档案资料,反复打磨文稿细节。书中既有亲属深情的回忆,也有学生真挚的追思,更收录了先贤部分论著与手稿,多维度还原了教育家的学术轨迹与人格魅力。编者在后记中写道:“西林之今日,离不开老一辈西林人艰苦创业与辛勤付出,先生们的精神早已镌刻在西林人心中。这套书不仅是对先贤的致敬,更是对其精神的延续。”正

是这份对历史的敬畏,让《扎根系列丛书》超越了简单的史料汇编,成为一部融合个人叙事与时代印记的“精神史稿”。

校史与思政:让“大先生”成为青春引领路人。如何让厚重的校史焕发时代生命力?西南林业大学以“校史里的思政课”为切入点,将《扎根系列丛书》内容融入教育教学,践行学校“红为底色、绿为特色、红绿相融”的思政育人模式。在首发式后的研讨会上,“永椿班”学生代表感慨:“读先生的故事,仿佛触摸到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们教会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热爱与坚守。”据介绍,下一步学校将推动丛书成为“行走的思政课”,将书中故事融入课堂、呈现舞台、走进山水,让先生故事成为鲜活的思想案例库,让“大先生”精神浸润青年心灵。

传承与展望:从校史文化中汲取前行力量。西南林业大学党委书记李永勤



高度评价《扎根系列丛书》的出版,希望扎根精神成为西林人文化传承创新的精神标识,也希望这套丛书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激励新一代西林人扎根专业、服务社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续写华章。

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今天,《扎根系列丛书》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鲜明的时代价值提醒我们:大学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浸润人心的精神传承。